

第三届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毛泽东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 问题意识的思想史考察^{*}

付克新

〔摘要〕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创造性贡献，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从思想史角度系统考察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逻辑构成，清晰呈现其思想结构和主要特点，有助于更为充分地理解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创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关键词〕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 付克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秘书长（湖北武汉 430072）。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地位和重要性都非常特殊。其地位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开创性发展与独特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问题的全新视野和问题域。其特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发展战略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与《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共同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高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道路和总体布局、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极具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特质和理论自信的“大战略”。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创立60多年来，学界对该学说以及创立该学说的标志性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文简称《正处》）的研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发展与创新研究”（17CKS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术景观。从整体上看，学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确的主题意识和学术旨趣，但在系统性和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整合空间。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除了集中于《正处》的文本和思想、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本身之外，还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战略的提出，学界围绕这些战略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内在联系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体现了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和一定的学术担当。不过，从当前能够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凸显并明晰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和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独特问题意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大战略的演进，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特质与思想品格。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与问题意识

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创立过程的考察，应当建立在对该学说进行宏观历史把握和恰当理论定位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从概念（或术语、词语）提出时间的早晚来确定该学说发明创制权的归属。^①虽然概念的提出有可能为学说创立提供思想资源或铺垫问题意识，但从根本上来说，概念能否真正成为学说的起点还要看提出者对这一概念所指称的现象或问题是否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阐述、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了学说的创立。

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而言，需要联系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系列有关国际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有关思想背景，才能够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和把握。从历史背景来说，国内方面，主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形成了迅速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历史契机和态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对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回应，《正处》在其着重探讨的十二个问题^②中延续了《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意识，并没有局限于对具体类型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国际方面，随着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揭露，客观上形成了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破除迷信苏联模式的思想解放浪潮（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揭了盖子”）。从思想背景来说，《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与创立，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系列核心问题意识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则比较缺乏相应的思想理论资源。综合上述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题的继续探索和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

^①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酝酿形成的贡献，特别是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相关思考，学界已经有较为系统的考察。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3页。

进行结合，从而提出了具有中国思维特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推动中国社会从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过渡、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维的转变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探索，凸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矛盾的战略把握和鲜明的问题意识。

在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过程中，为了推动社会形势和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化，毛泽东特别注重思想动向的问题^①，把握这个思想环节对于理解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过程和问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为什么特别注重从思想动向的角度来观察当时社会形势和政治生态的演化，才能够避开研究中出现的一个误区，即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着力点从关注思想动向转移到忽视物质利益矛盾上来，认为毛泽东不重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一视角实际上具有很明显的优势——因为《正处》的提出和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转变当时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把执政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那么从思想动向的角度入手可以较为便捷和直接地解决问题。但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缺乏充分的法治意识的情况下（虽然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强调了人民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当整风的路径选择从关门（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毛毛雨”）转到开门时，很容易违背《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力图实现从疾风暴雨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向说服教育小民主转变的战略意图，再次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生态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整风转向反右再转向反右扩大化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因为《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所致力推动的这种战略转变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共识，所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要四处吹风做宣传。^②考虑到这一时期的相关探索缺乏相应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探索，也就无法要求毛泽东等当时的主要创立者群体具有充分的理论供应了。^③

分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思想语境出发，把这一学说的主要文本作为考察的中心和重点，分析其内在的思想结构和问题意识；二是把60多年来学界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研究作为切入点，考察学界的研究中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分析和呈现，辨析、澄清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呈现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

作为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标志性文献，《正处》系统总结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这就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主要文本。不过，在阐发问题意识中的重要思想元素时，仍然需要把这一时期战略探索的标志性成果作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来把握，

①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79页。

② 可参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的年谱中关于这一时期宣传《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活动。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参见陈金龙《试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路径——兼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如果我们注意到邓小平1975年建议毛泽东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对这篇讲话重要性的强调，这种探索的开创性和理论供应的不足之间的反差就更为明显了。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参见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7月13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48页。

还需要结合《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等重要历史环节和相关文本才能够尽可能清晰地呈现问题意识的思想结构和演化轨迹。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社会治理的关注和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其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建设布局。这三大问题意识统摄这一时期战略探索的关键历史环节和主要文本，构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想主题。

首先，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不仅“超前”地提出并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治理问题（这一治理维度是内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总体格局之中的），还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合理把握的问题，凸显了准确判断主要矛盾这一重大战略命题。社会治理和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第一个问题意识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阐发出来的新型问题意识。其中，主要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个问题留待本文第二部分集中分析，这里只阐述和社会治理有关的问题意识。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中和社会治理有关的部分，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中都有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如何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这四种比较重要的政治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说明。在《正处》中，关于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突出表现在第一、二、七、九、十这五个主题之中。其中，第二、九、十这三个主题分别探讨“肃反问题”“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和“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是对当时出现的几种典型矛盾的直接回应。不过，促成这一回应并为这一回应提供方法论指导的，则是第一和第七主题。第一主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开题”，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内涵，强调两者的性质和解决方法都不相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第七主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进行社会治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中心是要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和各种利益，从而实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从今天的视野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从小社会治理的角度考量《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中的相关思想元素，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思想语境中，这些思想元素都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对当时表现比较突出的几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回应和说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战略方针。这一问题意识中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第二个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其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意识，实际上和社会治理问题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调动积极因素（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需要正确而恰当地处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而这些也都是社会治理问题意识中的内在构成部分。之所以把调动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意识与社会治理问题意识并提，关键原因在于这一问题意识的重心并不是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社会治理），而是在处理复杂关系的基础上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后者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具有关键地位和重大意义。

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开篇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

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 在系统分析十大关系及其正确处理方式之后，毛泽东强调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③ 毛泽东在《正处》中强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并在第一、四、五、六、八、十一这几个主题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怎么实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更为细致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意识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④ 在《正处》中，毛泽东把调动积极因素建立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之上：第一主题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⑤，强调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要采用民主方法，通过 “团结—批评—团结” 和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在阐述《正处》第一主题时，毛泽东有两个重要的观点值得引起注意：首先就是采用民主和说服教育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采取强制和压服的办法，这一点不仅高度契合民主的精神实质，而且在今天的社会治理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学界的现有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对法制的重要作用强调得不够充分。我们当然可以找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强调法制和守法的说明，但是这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或法治意识（同样适用于当时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正是为了推动人们的政治思维从阶级斗争向民主转变，而只有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都从阶级斗争的惯性中抽离出来，转变并稳固为建设时期所适用的民主方式，才有可能为法制建设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简言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恰恰构成法制有效运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法制意识不足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个方面，可能会由于忽视当时的历史—思想语境而陷入辉格主义的误区^⑥，从而无法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开创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进行合理的历史把握。

值得引起注意的第二个观点，是毛泽东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之中来处理。在他看来，“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⑦。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⑥ 可参考胡潇《毛泽东研究中“辉格”解释的反思——从对“大跃进”的考问说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9期。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①。这个观点充分说明了毛泽东试图借助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告别阶级斗争历史惯性的坚定意志和强大动力。此外，《正处》的第四（“工商业者问题”）、五（“知识分子问题”）、六（“少数民族问题”）、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十一（“关于节约”）这五个主题从分析具体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入，说明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和办法，其中有不少思想闪光点都值得引起注意，这里不再赘述。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第三个问题意识，是和《论十大关系》一起，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特别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布局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探讨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建设布局进行了战略设计，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泽东还明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垫了思想基础“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②在《正处》中，这一问题意识凝练为第三（“农业合作化问题”）和第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两个主题，更加直接地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强调工农业发展必须同时并举的观点，对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提出和阐发，实际上呈现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积极探索的根本目标，即集中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启动阶段。不管是《论十大关系》中的十大关系还是《正处》中列出的十二个主要问题，都围绕着这个根本目标。因此，我们在理解《论十大关系》或《正处》或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时，不能够回避这一具有引领作用的思想主题。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思想主题，促成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艰辛探索，为其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动力。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三大问题意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轴，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着力点，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毛泽东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核心问题意识辨析

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第一个问题意识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有待展开分析，这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之所以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问题意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探索和构想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确发挥着重心和中心作用。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后，怎么把握、如何定位社会主要矛盾，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毛泽东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做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①的战略判断，为中国实现从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的转变、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前提。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是怎么判断主要矛盾和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呢？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矛盾），但是没有提出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下文简称：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的阐述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毛泽东同意的部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②本来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阐述到此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表述的内容已经非常完整，但是八大决议接下来还有一句是毛泽东持保留意见或者说并不同意的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③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后面这个表述，认为这个表述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既和他关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以及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些观点有关，也和他并不认为当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完善的和完全建成并巩固的这一判断有关。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情况不同于旧社会。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初创阶段的中国而言，毛泽东认为这种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表现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实际上为不断改革完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从而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改革开放留下了逻辑空间。显然，毛泽东的判断和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第二部分表述相较而言，前者更符合实际。

有关毛泽东和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后一表述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兴趣，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正处》发表前后，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都看成是主要矛盾，这种把两个主要矛盾并提的做法和八大决议相比是退步。^④也有学者在较为详尽地比较分析毛泽东和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⑤上，认为从八大前后到八届三中全会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即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④ 汪青松 《论〈正处〉萌发的两个主要矛盾的思想》，《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⑤ 施肇域 《毛泽东与“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解的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①。在以“反思平衡”的方式比较研读现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第二种看法更为可靠，比较切合当时的历史—思想语境和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争论，让我们回到《正处》文本本身，看看毛泽东的思想是怎么从基本矛盾理论向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发展的。

在《正处》中，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分析从基本矛盾发展到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六个逻辑环节：（1）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2）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4）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已经建立的生产关系总体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还存在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5）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6）在做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进而表明了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②

不难发现，在紧接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阐述的是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虽然在《正处》中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主要矛盾”的提法（这可能和他不同意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最后一表述有关），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主要矛盾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点在1957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中阐述得尤其明显。在这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并经其修改审定的社论中，肯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判断的前一部分，并指出：“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必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③ 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矛盾性质的转变？显然，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在性质上的转变，和毛泽东在《正处》中关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在《正处》中，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

① 施肇域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③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

种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就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上层建筑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①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些矛盾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可以看出，《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直接思想资源和关键理论基础。如果按照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后一半表述所指出的那样，认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虽然我们可以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理解，但实际上是一方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把刚刚建立的社会制度确定为“先进的”，从而没有为改革完善社会制度留下空间。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利的。无怪乎后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③，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提法不仅在理论上结构更加完备，而且还为改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提供了思想前提。

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的把握，不能先入为主地或不加分析地放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来理解，也不能仅仅把《正处》或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放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来理解，而应该回到这一问题意识产生发展的历史—思想语境中去把握。从历史大趋势来看，承接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浪潮，毛泽东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革命胜利后要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战略构想，更在《论十大关系》中较为系统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特别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而在《正处》中，除了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之外，毛泽东还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布局以及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和《正处》的理解局限于社会治理，就很难解释在一篇论述社会治理问题的文献中，毛泽东为什么还要阐发另外两个问题，乃至还提出了要学习一切外国的好经验等重要思想。从这个角度看，从《论十大关系》到《正处》的探索，总的问题意识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建设方略，而《正处》则用具有中国共产党思维特质和时代特征的形式凸显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理念，来为刚刚启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社会涌现出来的主要矛盾命名。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思维方法和战略思维的鲜明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社会矛盾治理的维度，而是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综合把握，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发展战略的宏观考量，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大战略。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基础，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关系。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分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页。

析，毛泽东将其创造性地引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矛盾的考察。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改变，但是性质和情况与旧社会已有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这就意味着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中处于基础地位。从这个角度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有助于把该学说置于其创立的历史—思想语境中来考察，更为恰当地分析其思想结构、更为准确地判断其理论主题，从而避免历史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误区。在《正处》中，紧接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述的，正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重提阶级斗争。在提出主要矛盾之后紧接着提出中心任务（发展生产力），充分体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思想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阶级斗争。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核心问题意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关键作用。毛泽东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也容易引起争论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①，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观点突出了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把党的性质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证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之中，实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融合与发展，与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重要思想遥相呼应。

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在准确把握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就必然要提出解决主要矛盾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主题。围绕着中心任务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接续探索，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命题，成为不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进步的“大战略”。

综上所述，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心任务，中心任务的实现又需要适时提出一系列战略方略来引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大战略的演变，就是“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发展战略”这三个逻辑环节在现实中的具体展开。从历史角度看，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初始条件非常薄弱的东方大国要顺利开展现代化建设，受到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制约作用甚至强大到能够改变关于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判断。众所周知，党的八大已经在战略上对主要矛盾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而《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但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复杂作用的影响，不仅造成改变主要矛盾判断的沉重历史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不过，即便在国际上受到封锁，即便在国内的探索中遭遇过重大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建设方面、在人才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方面，为改革开

^①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

放的顺利开启奠定了基础。^①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多大程度上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战略探索相关，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辨析。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正确探索，在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取得上述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发展战略的创造性接续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这些战略探索建立在深刻把握中国建设实际的基础之上，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开放的思想品格和坚定的理论自信。在研究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时，有学者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应该以社会矛盾等概念代替它。^②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理解说明了对《正处》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解还没有系统和深入到内在理解的维度，仍然停留在外在的反思和批判层面。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内在的把握和理解，系统考察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思想语境，可以发现，这种具有中国思维特质的学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值得继续坚持和发展。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固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诸如生态危机、全球变暖、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方面都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回应人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危机，需要充分重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的积极意义。实践证明，中国不仅能够在全世界治理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而且在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日益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

60多年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探索、发展和创新，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主线和理论主题，是极具中国共产党人思维特质、理论自信和思想品格的综合性理论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矛盾的治理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问题意识的发展与创新，为不断开辟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战略指导，也为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放的思想品格与博大的理论情怀。

(责任编辑：青 成)

^① 党的十八大把这个基础概括为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② 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一般来说都没有深入考察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理论基础以及“历史—思想”语境，主要是表达了一种术语选择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争议，此处不列出参考文献。